

布哈林文选

中

東方出版社

布 哈 林 文 选

中 册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

東 方 出 版 社

参加本卷编选和译校工作的有：
郑异凡、周邦媛、杨彦君、宋洪训、
王家华、蔡恺民、夏道源、张海滨、
李兴耕。

布 哈 林 文 选 中册

BUHALIN WENXUAN

编者/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

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

封面设计/郭振华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5 字数/299,000

版次/1988 年 4 月第 1 版 198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5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33-4/Z·2

定价 4.35 元

目 录

关于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摘录)	1
八 我们的农民政策	1
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三次非常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1
谈谈研究列宁主义的问题(短评)	63
作为一种思想家类型的列宁	67
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	
(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新经济学》一书的批评性意见)	78
一 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彻底性问题谈过渡时期 规律的特征	79
二 关于经济生活调节者的问题,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同志的基本错误	87
三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或为什么不当以普列 奥布拉任斯基代替列宁	100
科学和苏联	120
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的可能性	133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二十次会议 上的发言	175
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建设时期	198
粮食收购工作和沙赫特事件的教训与党的任务	
(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的总结)	209
一 粮食收购运动的教训	210

二 沙赫特事件	231
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	
(在列宁忌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240
论农民政策(摘录)	267
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	
——为迎接新的经济年度而作	270
目前形势和我们报刊的任务	
(在第四次工农通讯员会议上的报告)	300
列宁和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	324
列宁的政治遗嘱	
(1929年1月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	338
一 从社会主义建设可能性的观点对我国革命的总的估计	340
二 我国发展的总方向 and 政策的总方针	342
三 国际形势和对它的估计	343
四 从国际形势着眼确定我们的战略和策略的基础	345
五 经济政策的基础	347
六 基本阶级关系问题	351
七 文化建设问题	353
八 国家机关以及国家的和党的领导问题	355
十月的纲领(纪念我们党的纲领发表十周年)	361
技术经济革命, 工人阶级和工程师	375

关于联共(布)第十四次 代表大会的总结(摘录)

(1926年1月5日)

八 我们的农民政策

从这里我就更详细地来谈谈农民问题，因而在这里我要更多地作些重复，我要说说许多同志从其他的发言中已经听到过的问题。

我们现在可能在两个方面犯错误：或者是看不到日益增长的富农，或者是不了解中农的需求，对中农估计不足。人们指责我们，好象我们没有看到富农的危险性。我们指责反对派的同志不了解关于中农问题的全部重要性。但是我们大家都同意，有过个别情况，人们的确缩小了富农的危险性。当我们讨论我们政策的原则问题时，我们首先需要看到基本的、最大的、最有决定性的东西。如果我们在次要问题上犯了错误，这还不那么可怕。但是我们如果忽略了某个庞然大物，那就糟糕了，那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错误。因此，同志们，如果我们提出关于我们的农民政策的问题并且问道，谁是最主要的庞然大物，我们就回答说：中农。例如，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我们的全部经济必须适合于中农经济。为什么中农会升到了首要地位，为什么正好是它呢？这正是因为它是“庞然大物”。有些同志钻进了旧书里，很好的旧书里，发现我们有这么多雇农，这么多贫农，这么多富农等等。但是

这种统计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中农之所以在我们这里起着这么大的作用，完全不是因为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我国伟大土地革命的遗产。难道能够忘记，几乎全部地主的土地——82%——实际上平分给农民了。这对不对呢？对的。我们有过一段剥夺富农的过程，我们把富农分得一干二净，分了它的财物，分了它的家畜和土地。这是过去的事实，大家都知道这些事实。两个过程——“剥夺地主”和“剥夺富农”——导致了农村的中农化。分化过程现在是不是受到什么障碍了呢？是受到障碍了。什么障碍呢？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土地停止进入商品流转。如果不停止的话，它就通过买卖很快转到比较富裕的农民手里去了。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土地买卖。这就是农村分化的巨大障碍。

我们的法律支持的不是上层阶层，而是力量单薄的阶层和中农阶层。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由于上述过程和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农村现在基本上还是中农的农村。基本上中农构成农村居民的大多数，中农经济在我国整个农业经济中成了最大的经济因素。因此，当我们展望农村，当我们在这里给自己提出最中心的任务、最主要的任务的时候，那就十分显然，不经常解决我们就无法生存的最中心任务是，懂得同中农建立巩固联盟的必要性。如果反对派中的某些同志，特别是象瓦尔丁那样好尖叫的同志，论述“中农布尔什维主义”，提及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等等，那么这是极端不了解我们的政策。

人们常常回忆，以前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们有过什么情况。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们对于全部贸易一概禁止，并反对任何破坏这项禁令的人，把他们当作投机分子、渔利商人、坏蛋等等。我们是这样做的，这在当时是必要的——这是国内战争时期。

但是请你们回忆一下，当我们开始转入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

宁写了些什么呢？他写道，现在已经不能把任何贸易都当作是投机买卖了，现在我们自己许可做买卖，而且自己在做买卖。所以，现在当人们说：中农，这就是投机商，因为它卖粮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我们自己都鼓励这种贸易，因为我们的政策已经不是骂中农做买卖，而是抓住它的贸易活动和利益，把它引入合作社，然后通过合作社使它与我们的工业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不知不觉地把它引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比叫嚷投机多少要困难一些、麻烦一些。但是不这么做，我们就绝对没有别的办法。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农是这样一种因素，它从两面“受冲刷”，越来越单薄。一部分上升为富农，一部分则下降为雇农。我们这里有这种过程吗？有。但是它是不是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么强烈呢？不，不那么强烈。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农也是相当稳定的，而在我们的政权下它就更加稳定好几倍。为什么？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条件是这样的。我们同富农作斗争，支持穷人，跟中农搞好巩固的联盟，把土地从商品流转中剔除出去。所有这一切就使中农群众变得更为稳定。因此我们的中农问题仍然要在很长的时间内作为中心的和基本的问题。这里我应当说一说下列情况。许多人这样认为：如果你们净叫嚷中农、中农，而关于富农的危险性叫嚷得少一些，那你就把全部政策搞偏，而打不中要害。而对于这一点我们说：我们并不否认富农的危险性。但是如果你们对于中农注意得不够，那么你们就会因此给富农帮了最大的忙，因为除了使中农脱离无产阶级影响之外，事实上再没有帮助富农的更好办法了。我认为，在关于中农、富农和贫农相互关系的全部争论中，这一点如果说不是中心的，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每一个嚷嚷“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也不是每一个叫嚷“富农、富农”而忘记中农的人，都对富农进行了很好的斗争。他打的往往不是马，而是辕。

富农为什么有力量呢？它的力量不仅在于它对贫农的剥削，而且还在于它使中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依附地位。如果富农是孤立的话，难道它对于我们能有巨大的危险性吗？任何巨大的危险性都不能有。它的基本危险性就在于，他能够在经济上千丝万缕地控制中农，并且在此基础上也在政治上加以控制。富农是一个不大的集团。可是在有些地方他们也钻进了苏维埃。为什么？因为有中农把他们引进来。为什么要引进他们来呢？因为富农在经济上有时更接近中农，因为它比我们的合作社更会做买卖。如果有人反对我们说：你们关于中农说得太多了，关于富农的危险性叫喊得太少了，那就可以把这样的反对者叫做怪物，因为，实际上如果不把中农从富农那里夺过来，那又怎样去对富农进行斗争呢？这是主要的。再没有别的更主要的同富农作斗争的手段了。

如果我们现在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中农当作投机分子而稍微刺激它一下，那我们就会因此给富农帮了忙。如果我们不在我们的报告和讲话里多多提及中农，那我们就会把它推到富农一边去。如果我们在实际上，在我们的经济措施上不够认真地对待中农，那我们就会把它推到富农一边去。如果我们不把中农合作社整顿好，而是让中农看到，合作社买卖做得不好，富农做得好，那我们也会把它推到富农一边去。如果我们在苏维埃中的工作做得不好，我们就会把它推到富农一边去。如此等等。它，富农，将会利用中农的选票进入合作社和苏维埃，那时它就真正是危险的了。

这样，能不能离开中农问题来提富农问题呢？这将是错误的、荒谬的问题提法。对富农斗争的主要办法，就是使中农脱离富农。

但是无产阶级在农村中争取中农的斗争，只有工人阶级在农村整个雇农和贫农中间拥有坚强支柱和对自己政策的坚强支持时才能最有成效地进行。给贫农以经济的、生产业务上的、“工会的”（保护雇农利益）、政治的帮助，不言而喻，是我党最责无旁贷的

义务。

现在来谈谈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你们知道，党代表大会上的意见分歧是从哪里来的：加米涅夫同志，再早一点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小册子《列宁主义》中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实行“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让步的路线的决议。这就是说，我们党早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就作了根本转变，在反对派看来，代表会议正是对富农作了让步。人们那么害怕富农，到处都只看到富农。我们不是这样对待这个问题的，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评价党的决议。这些决议真的是“对资本主义分子”让步吗？不是的。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面临的是什么呢？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面临的是，在农村的某些地方发生一切阶层对我们和我们的良好的法律表示不满。我给你们列举几个关于租佃和雇佣劳动力的实例。我们对于租佃和雇佣劳动力有过极其严格的法律。许多从来没有到过农村而很少研究农村的人都听到过关于租佃的事情。从前租佃是这样的：农民向地主租用土地，付给他哄抬得很高的租金，所谓“充饥租佃”。而关于这种租佃的概念还一直存在于某些人的脑海里，他们认为，就是现在的农村也还是那样。

然而，谁现在租用土地呢？我们这里常有这样的情况，比较富裕的向比较不富裕的、向贫农租地。一个人有一定数量按照定额规定给他的土地，但是他没有农具，没有马，他不能耕种。富农分子想要租用贫农的土地，但是租赁是被禁止的。因而就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想赚几个钱的贫农冒着破坏我们法律的危险终于把土地租了出去，而富农则利用这一点就付给比较便宜的租金，比公开准许和公开租用的情况下付得少。一俄亩地付几十戈比就算了。

这对于我们有利吗？我们土地国有化的目的是为了以后叫贫农再以极低的价格把土地交给富农使用吗？使这种租佃合法化并进行监视，以防止产生奴役性的合同，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呢？问

题就是这么摆着的。

雇用劳动力禁止得更加严格。而这个问题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有了不同的提法。在代表会议以前，按照法律规定的结果是这样：我们雷厉风行地禁止了雇佣劳动，可是我们忘记了，农村中绝大部分的过剩人口不能把劳动力用于土地。我们说过而且写出了一道很好的法令：禁止雇佣劳动，我们使你不再受到剥削。

可是贫农呢？他这样想：如果你们一块面包也不能给我，那我就宁愿跑到最坏的恶棍富农那里挣块面包吃。但是因为这个最坏的恶棍富农知道，他被禁止雇佣劳动力，而贫农也知道这个，但还是来要求受雇，因此富农就利用这一点说：我要少给钱。同时，因为这种雇用合同不是公开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雇农的利益得不到任何工会的保护。这就是结果。这就是说，我们这里不仅富农不满意，连贫农也不满意，因为我们禁止他受雇于人和出租土地，并且我们这里中农也不满意。为什么中农不满意呢？因为中农一方面倾向于富裕农民，而另一方面又倾向于无产者。但是，问题当然不仅在这里。整个农业经济的增长和中农经济的增长（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是经济的基本部分）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引起中农经济商品率的增长。中农开始对于扩大商品流转范围表示关心。它自己做的买卖增加了，卖得更多了，同时也想多买点。以前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的残余、对贸易的各种恐惧、过分热衷于行政手段已经使它厌恶了。凡是限制商品流转的一切措施，都给日益发展的中农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因此它坚决反对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

所有这一切还有其另外的一面。那就是：经济的整顿和提高——首先是中农经济的提高——要求有更精确的核算。为了这一目的就必须要有政府措施的正确性、革命法制。或者说还有另一个问题——中农经济的提高引起对合作社的向往。但是，如果

不消灭以前的制度，如果不实现自愿的原则、选举制、被选人报告工作情况的制度等等，合作社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由此产生许许多多关于活跃合作社和苏维埃、关于革命法制等等方面的措施。所有这些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决定的措施首先都是为了迎合中农的。

所以，我们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说：就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文件、不是一纸命令，对我们重要的是行动。我们看到，我们的禁令措施不仅对于富农翻开了不利的一面——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坏事，而且对于贫农、对于力量单薄的中农也翻开了不利的一面。我们想要保护雇农，我们愿意保护贫农，可是实际结果却是我们妨碍了他们。我们说：来吧，让我们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换一个方式干吧。我们准许租赁的相互关系，但是我们将要坚决反对愚弄贫农。我们许可更广泛地利用雇佣劳动，但同时我们要采取一切措施，通过工会，通过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在剥削者面前保护雇佣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紧密地联结成为一股阶级力量。

不言而喻，由于取消某些障碍使富农也占到了便宜，这是真的。难道资产阶级分子没有从新经济政策占到便宜吗？占到了。难道我们对于这一点事先没有估计到吗？而难道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是为了这个资产阶级而实行的吗？这么说来，整个新经济政策都“正是对资本家”的让步吗？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对小商品生产者和农村，对农民的让步。它同时也是我所说的战略手段：退却、改组队伍和以旨在保持同中农联盟的唯一正确和唯一可能的崭新方法实行进攻。要知道，当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除了我们恶毒的敌人之外，谁也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是对资本家的让步。只有我们最恶毒的敌人才说：“共产主义破产了，共产主义什么也不剩了，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向资

本家卑躬屈节，对资本家作了让步，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难道我们的敌人不是这样说的吗？但是，难道我们对于这种想在我们队伍里散布恐慌情绪的胡说八道屈服了吗？没有。我们从新经济政策退却了吗？没有。我们沿着这些轨道走去，我们打了我们的敌人不是十个耳光，而是二十、三十、四十个耳光，而且还在打，将来还要继续打。现在在我们掌握着强大的命脉的条件下，我们正在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我们现在已经不用空文、废话来安慰自己了。对于我们重要的首先是这些东西的真实的内容。我们说：我们发展商品流转，这个商品流转可以带来更加大得多的利益，将加速整个流转，也将加速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周转，它将更快地增长；在我们的国库中我们将有更多的钱；我们将能够收到更多的税。我们将能够实际上帮助贫农和中农。我们现在不说把每个富农的裤子脱下来，把每一座铁屋顶拆下来；但是我们对贫农说：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吧，把中农组织在自己的周围，要学习不用靠社会救济养活的办法去反对富农，要学会自立，要学会用组织的方法来安排自己的经济，而我们，国家、党将帮助你们。要学会不是按照贫农委员会那样，而是根据新的条件把自己改组为阶级力量。到合作社来吧，要在经济轨道上打击富农，要用合作社，用政治和经济战线排挤富农，向富农进攻吧。

新反对派的拥护者说，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是对富农的让步。你们看见，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里在对农民的基本群众即中农和贫农的队伍进行改组，在最初时期富农也利用了贫农。我们不可否认这一点。但是并不是为了偏爱富农我们才想出这个名堂来的，正如不是为偏爱资本家我们才想出整套新经济政策来的一样。

现在我要问一问你们：把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看作是对富农让步的观点，同反对派对我已经在这里说过的其他问题的提法有无联系？当然有联系。因为，如果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却，

那么新经济政策在农村中的发展也就是这种退却的继续，而退却就意味着对阶级敌人让步。而阶级敌人就是富农、资本家。反对派的所有论调都照着一条路线来的：无论对在单独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无论对新经济政策的观点，无论对我们国营工业类型的怀疑，无论对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的解释，所有这一切都照着一条路线来的。不言而喻，如果对富农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和农民的中农部分建立牢固的联盟，那么这根本不排除组织贫农，而是以组织贫农为先决条件。没有我们这个在农村中的最主要的支柱，我们就什么也办不成。贫农是我们最可靠的支柱，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一直帮助贫农而且将来还要帮助贫农，因此把我们的十月全会的决议看作是对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修正是十分愚蠢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说过不止一次了。这不过是对于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的补充。

我们认为对富农的主要斗争首先是在使中农脱离富农的战线上，因为这是比较困难的任务。但是我们在农村中的支柱是贫农。我们常常有大量的富农和贫农签订的奴役性合同。有时这些合同甚至不是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有这样的情形，富农虽然不使用雇佣劳动，但在间接形式下却是一个不小的剥削者。让我们举一个最普通的例子。假设富农有一部打谷机，他把它用高价租赁出去，因而在它上面发大财，或者他用高利出借种子。这种剥削形式太多了。贫农、中农都受它们之害。但是，同志们，为了对富农进行斗争，需要善于首先使中农离开它，同时以贫农为支柱。富农同中农联盟会给富农以力量。

我们现在应当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农村政策方针了。我们的支柱是贫农，包括雇农在内。这是我们影响的最忠实的传播者。我们可以在贫农帮助下争取过来的同盟者是中农。我们的敌人是富

农。这就是许多人喜欢“徘徊”的那三棵松树，这就是许多人从里面怎么也爬不出来的那三棵松树。不能使一个任务脱离另一个任务。不能把关于贫农的任务和关于中农的任务两下分开。贫农不能单独地对付富农，而中农没有贫农也不能单独地对付富农。不能使同富农斗争的任务脱离把中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问题。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农村阶级政策的同一问题的不同形式。关于农民问题的情况就是这样。关于倾向问题也是由这一点来决定的。代表大会谴责了两种倾向：既谴责了看不见富农危险性的倾向，也谴责了看不见同中农结合的全部重要性的倾向。党有义务对富农剥削者的侵犯给予反击；党应当特别警惕注意，使与中农的“牢固联盟”不致遭到破坏。只有通过这个联盟并以贫农为支柱，我们才能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孤立富农。

译自《真理报》1926年1月12日。

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省 第二十三次非常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926年2月)

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们的党中央向你们的代表会议表示祝贺(掌声)。你们的代表会议结束了列宁格勒党组织发展中的整整一个时期。它是列宁格勒组织历史上同时也是我们全党历史上一个极其艰苦的阶段的终结。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列宁格勒党组织应该——并且毫无疑问会做到这一点——使整个党的战线排列得整整齐齐，使自己的所有组成部分——上层组织、广大中间阶层以及党的基层组织——都重新占据理应属于它的地位，即要作为我们全党的和我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掌声)

同志们！我们的争论是在我们国内的情况极其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大家都知道，一方面，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我们经历了通常所说的经济蓬勃增长的时期：我国工业的增长，农业的增长，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增长，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国内贸易周转的增长等等。同时，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我国总的经济发展的范围内，我们相对地加强了我们的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和我们的一切命脉，我们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主要命脉——社会主义的工业。在我国的总的经济中我们加强了我们的交通运输业，我们的银行和我们的信贷机构；在国家垄断的原则下我们发展了对外贸易，巩固了国营商业，特别是在其主导部门，也就是在批发商业和批发零售商业中，我们巩固了——尽管还远远不够而且还远远没有按照

我们所需要的比例——合作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当前情况的主要特点，就是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在一些矛盾的形式中进行的。我们发展起来了，但与此同时，私人的——小的和部分中等的——工业家也发展起来了，农村中的商业资本家、采购商和富农也发展起来了，——总之，在总的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在我们经济向前发展的基础上，在我们实行进攻的同时，在我们的经济命脉在整个经济中实行进攻的同时，一些反对这些命脉的形形色色的和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成分，也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我认为必需简单地谈谈关于另一类矛盾，另一方面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商品流转中，在那里作为粮食购买者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及作为粮食出卖者的农民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对抗的。

同样不应忘记工人阶级自身内部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我国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当然，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同工人阶级和大资本之间的矛盾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它们毕竟是矛盾。其次，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不同于无产阶级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也不同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在我们的无产阶级内部毕竟存在着这些矛盾，它们反映和表现为工人阶级某些阶层内部的某种动摇，它们在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唯一的党内也有反映和表现。我在这里所指的是工人阶级内部的这样一些矛盾，如我国工人阶级的“管理”干部与“被管理的”群众之间的某些矛盾；有经济才能的工人和普通工人之间的矛盾；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即做粗活的工人之间的矛盾；老的基于工人阶级和新参加工作和刚刚进工厂的工人之间的矛盾；最后，年龄上的矛盾，即年长的工人干部和年青的工人干部之间的矛盾，由于生活经验不同所形成的矛盾。

这后一种矛盾不是阶级性质的矛盾，这些矛盾与工人阶级和